

边界组织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席莹月

西安邮电大学，陕西省西安市，710061；

摘要：本文首先提炼了边界组织的概念内涵；其次，从组织层面探讨了边界跨越者的影响效应；最后，总结当前边界跨越者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并提出未来研究应深入探索边界组织在组织与组织、技术与市场之间所发挥的作用，拓展边界组织理论。

关键词：边界跨越者；边界组织；研究综述

DOI：10.69979/3029-2700.25.03.091

引言

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跨界融合发展已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众多企业正通过跨界搜索、跨界合作以及跨界并购等途径，整合外部资源，推动再创新，从而实现价值的跨越式提升。在此过程中，边界跨越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边界跨越者既是组织之间的分割线，也是连接组织与外部环境的桥梁，一方面作为分割线帮助组织应对技术变革等外部冲击（李元旭等，2021），另一方面作为桥梁促进组织的内外部资源整合，完成价值跨越。作为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纽带，边界跨越者在跨界融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边界跨越者相关内容的研究还相对零散，未能整体呈现边界跨越者这一主题下细分领域的研究全景。因此，本文系统梳理边界跨越者的概念内涵，剖析不同层面边界跨越者的角色和功能并系统的评述边界跨越者的影响效应。形成对边界跨越者前因后果和作用机理的清晰、系统的认识，最后，对边界跨越者理论值得探索的研究议题进行展望。本文整合现阶段边界跨越者理论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希望为后续边界跨越者深入研究提供思路。

1 边界组织的概念和界定

边界跨越者的概念最早由 Allen 和 Tushman 提出，他们将其描述为受人尊敬的守护者，可以重新定向、分配关键信息，促进个人、部门或领域之间的沟通和合作（Fleming 和 Waguespack, 2005）。随着研究的深入，Moore（1966）将边界跨越者的研究范畴延伸至组织层面，构想了一种类似于边界组织的概念，并将其命名为公共利益科学组织。随后，Guston（1999）在 1999 年正式提出了边界组织的定义，用以指代那些在科学与政治之

间架设桥梁、调和不同利益的中介机构。他指出，本质上并不存在无法解决或必然导致不稳定的活动。通过探索新的视角，确保各方适当参与、平衡利益以及科学运作，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理论框架，问题便能够得到解决，效率也能得以提升。Guston（1999）提出，边界组织具备三个显著特征：首先，它为边界两侧的主体提供了一个融合的空间，使边界对象的创造和使用得以合法化；其次，其运作需要三方共同参与，包括边界两侧的主体以及作为专业化中介机构的边界组织本身；最后，边界组织在发挥作用时，对两侧的边界对象均负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边界组织用以探讨科学研究与政策导向的实践问题（许可等，2021）。边界组织理论认为（李玥等，2024），边界组织是骑跨在不同组织之间的柔性社会组织，具有多边互动性、服务专业性和稳定协调性（Guston, 1999；许可等，2019）。“边界组织”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位于两种不同社会领域之间，通过与边界双方的互动，促使边界逐渐模糊并实现融合（许可等，2021）。这类组织的边界具有柔性和模糊性，这种特性使得边界双方能够共同参与其中，从而使边界组织能够高效地为双方提供服务，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同时，这种模糊性仅限于边界组织内部，并不会干扰边界双方原有领域的规则，使得边界现象通过边界组织得以有效“化解”（许可等，2019）。

2 边界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边界组织最早是基于科学与政策的跨界活动，用来探讨科学研究与政策导向的实践问题。边界组织能对企业创新全过程的跨界资源整合发挥导航、集成、催化等作用，作为企业与外界组织联系和任务协调的枢纽，或自身向企业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孟庆涛等，2020）。

同时,边界组织可视为企业的边界跨越伙伴(Caloffi 等, 2023)和边界协调者(Shi 等, 2023),其核心功能是帮助溶解边界组织双方的界限,并为组织的跨界活动提供信息、技术、法律等支持(Perkmann 等, 2015; 樊春良等, 2018)。李正风(2006)指出,构建科学与政府之间的新型关系离不开边界组织的参与,其出现是科学知识生产与社会系统联系日益紧密的产物。解本远等(2018)的研究表明,边界组织为美国的科学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搭建了合作的桥梁。Gustafsson 等(2018)提出,边界组织常被用于解决专业知识与科学政策之间的边界问题,他们在研究中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视为一个边界组织,但并未详细阐述其具体特征及适用条件。Selzer 等(2020)在研究美国大湖区域资源治理时指出,该区域的渔业委员会等组织作为边界组织,推动了科学家、政策专家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为合作决策提供了支持。许可等(2019)认为,边界组织的出现不仅维护了社会边界的秩序,还促进了边界双方的信息传递,保持了边界的动态性。边界组织在众多社会边界中均能发挥作用,确保了创新的累积性、资源的稳定性以及创新能力的持续性。

3 边界组织的影响效应

边界组织诞生于跨界活动中,边界组织的前身,被称为标准化程序包,指的是共同参与活动的不同界域成员集合(Fujimura, 1992)。现有关于边界组织影响效应的研究多体现在科学与市场的界域之中。许可等(2021)研究发现构建作为边界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分析框架,可以实现收益与效率的双赢、更好地建立信任关系、将成果转化中的偶然性必然化,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李玥等(2023)基于边界组织理论,结合扎根理论探索了“创新服务组织—赋能机制—企业边界管理能力”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知识边界型的赋能机制包括研发优势传导机制和信任关系培育机制,技术边界型的赋能机制包括平台生态联动机制和技术资源供给机制,市场边界型的赋能机制包括用户数据反哺机制和应用场景拓展机制。许可等(2019)将边界组织的理论和概念扩展至技术转移领域,提出了边界组织范式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促进了技术转移机构的未来发展。

4 总结

4.1 结论

本文对边界跨越者的研究进行回归和系统性梳理,明细了边界跨越者研究发展脉络,梳理了边界跨越者概念内涵及分类功能,围绕个人层面与组织层面对边界跨越者的影响效应展开分析。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组织层面的边界跨越者,即边界组织而言,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科学与政治界域之间,认为边界组织是他们之间的桥梁。边界组织能够促进边界双方主体的信息传递等工作,并且对边界双方主体的合作产生影响。

4.2 未来展望

现有关于边界跨越者理论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总体而言,仍需要进一步对薄弱环节展开深入研究。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推进边界跨越者的研究发展。

现有关于边界组织的研究较少,主要探讨其在科学与政治界域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边界跨越者理论的拓展,边界组织不仅可以在科学与政治界域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可以在与技术、市场、组织与组织之间,作为链接技术与市场、组织与组织的桥梁发挥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边界组织在组织与组织、技术与市场之间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拓展边界组织理论的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 [1] 李元旭,胡亚飞. 新兴市场企业的跨界整合战略: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 43(10): 85-102.
- [2] Fleming L, Waguespack D. Penguins, camels, and other birds of a feather: Brokerage, boundary spanning, and leadership in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ies. 2005-04, opensource[J]. 2005.
- [3] Guston D H. Stabiliz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US politics and science: The role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s a boundary organization[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99, 29(1): 87-111.
- [4] 许可, 张亚峰, 肖冰. 科学与市场间的边界组织: 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创新[J]. 中国软科学, 2021, (06): 64-73.
- [5] 李玥, 邓倩玉, 赵天一等. 创新服务组织赋能视角下企业边界管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OL]. 南开管理评

论,1-19[2024-03-11]

[6]许可,刘海波,肖冰.基于边界组织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新范式[J].科学学研究,2019,37(07):1231-1237.

[7]孟庆涛,徐雨森,李海波.科技服务组织类型与支撑能力组合研究[J].科研管理,2020,41(10):156-163.

[8]Caloffi A, Colovic A, Rizzoli V, et al. Innovation intermediaries' types and functions: A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3, 189: 122351.

[9]Shi Y, Cui T, Kurnia S. Value co-creation for digital innovation: An interorganizational boundary-spanning perspective[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23, 60(5): 103817.

[10]Perkmann M, Schildt H. Open data partnerships between firms and universities: The rol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5): 1133-1143.

[11]樊春良,马小亮.科技与政策之间的边界组织[J].科学学研究,2018,36(08):1353-1359+1420.

[12]李正风.塑造政府与科学之间的新型关系[J].中国软科学,2006,(06):95-100.

[13]解本远,贺晓慧.美国科研治理模式的演变及启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68-74.

[14]Gustafsson K M, Lidskog R. Boundary 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J].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2018, 19: 1-11.

[15]Selzer M, Jonas J L, Pebbles V, et al. Crossing boundaries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y: Two case studies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s in the Great Lakes Basin[J]. Journal of Great Lakes Research, 2020, 46(4):933-946.

[16]Fujimura J H. Crafting Science: Standardized Packages, Boundary Objects, and "Translatio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A. Pickering[J].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68: 214.

作者简介:席莹月 1999 01,女,汉族,陕西宝鸡,硕士研究生,融合创新,西安邮电大学。